

红色印记

# 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孟强伟 文/图

闽人闽地历史文化

## “国际性”语言：闽南方言

□杨志贤

闽海之滨,生活着勤劳勇敢的闽南人,他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为闽南方言。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和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有很深的渊源,同时也带有土著语言的印迹。秦汉以来的中原人民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迁徙南下,来到闽南,带来了他们所使用的各个时期的中原汉语,并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与当地土著语言相融合,在闽南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和发展出闽南方言这种重要的汉语方言。

说起闽南方言的形成,得追溯到秦汉以后汉人入闽的历史。据《史记》记载,秦朝末年,秦军南下征伐南越,后秦朝灭亡,这些秦军将士及随带的家眷奴婢就留在了当地。之后,汉人入闽的记载屡见于史书、地方志、族谱、考古资料等。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开始大量入闽。《三国志》记载了崛起于江东的孙吴集团为了扩展势力范围,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同时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战争结束后,除了一些携带家眷的将士留了下来,还有一些驻守当地的将士与本地人通婚组建家庭,也定居于此。清嘉庆《惠安县志》就记载了本县黄氏祖先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当时建安郡辖下有东安县,包含今南安、同安等区域。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到东晋时期南北分立,再到南朝的宋齐梁陈,不断有中原汉人或为躲避战乱或是为了其他原因纷纷南下,导致了汉人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入闽。《太平御览》记载:“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陈书》也记载:“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当时汉人入闽的通道既有陆路,也有海路。由海路进入闽南地区的汉人多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先在沿海江口设县,然后以此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迁移,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方言区。这些早期入闽的汉人带来了上古、中古汉语,也包含一些先秦两汉古方言、古吴语和古楚语的成分。有学者用语言年代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闽南方言与上古汉语分化出来的年代大约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正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界点。由此看来,秦汉到两晋是闽南方言的形成时期。

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闽南方言也不断地发展变化。入闽汉人和土著长期共存,汉语逐渐成为强势语言,但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土著语言,并在闽南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另一方面,隋唐以后又有大规模移民进入闽南地区,例如陈元光进驻开发漳州等。这些入闽的汉人带来了不同时期的中原汉语,不断地丰富了闽南方言。闽南方言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因为不断南下的汉人发生了变化,不可避免地引起闽南方言的发展和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闽南方言所保存的历代古语词中可见一斑。闽南方言所保存的古语词既有上古汉语的常用词,如“日”(太阳)等;又有唐宋以后的古汉语词汇,如“边头”(旁边)、“暝”(晚上)、“搵”(投击,击打)、“散”(解开)等。

从时间上看,泉州地区开发较早,是闽南方言最早的发祥地。而处于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的闽南方言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把福建分为五州五郡,其中就有泉州清源郡和漳州漳浦郡,大概那时就已经初步形成了闽南方言区北片和南片之分。南北两片不同口音正好分布在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而厦门是作为通商口岸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主要居民来自泉州、漳州地区,因此它的闽南方言是在泉州、漳州两地方言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闽南方言区可以分为四片:东片以厦门话为代表;北片以泉州话为代表;南片以漳州话为代表;西片以龙岩话为代表。

泉州、漳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方言虽然在语音、词汇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上是相同的,彼此可以通话。流传到台湾岛和南洋群岛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通行的闽南方言,也大多是这三地的移民带去的,只是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有所不同。

远离中原本土而又得以生存下来的闽南方言,在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具有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稳定性特点。如今的闽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依然保留了上古、中古汉语的特点,是“古汉语的活化石”。例如,语音方面,闽南方言依然具有上古汉语声母“无舌上音”“无轻唇音”的特点,保留了六个辅音韵尾-m、-n、-ng、-p、-t、-k。用闽南方言朗读古诗词格外富有韵律之美,不论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还是唐代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都押韵和谐,朗朗上口。词汇方面,保留了许多单音古语词用法,如“芳”表香,“跋”表跌倒、摔倒,“否”表坏、恶,“面”表脸,“转”表返回,“褪”表脱衣服,“走”表跑,“嗜”表财物,“楞”表饥饿。语法方面,一些虚词和语序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如“修饰语放在谓语的后面”“限定语放在中心语的前面”。

闽南方言及其所承载的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代意义。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闽南民系的形成、闽南文化的形成都有密切的关系。闽南人开拓的脚步从未停止,闽南人迁徙到哪里,就将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带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数多达数千万,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性”语言了。

林区和基本建设工地,能够长期坚持学习,四季常青的“铁民校”已经在福建各地农村遍地开花。在“铁民校”带动下,全省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事业不断巩固发展。

由于方言众多,在开展扫盲运动的过程中,福建各地农村还着力推广普通话。在此之中,方言复杂的大田县成为全省第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县。1952年,全县办起1000余所民校,组织了90%的青壮年参加学习,由小学教师和其他识字的人担任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该县注意把学注音符号、学文化和学普通话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宝贵经验。经过8年的努力,全县基本普及普通话,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也会听、会讲日常生活所用的普通话。

1958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大田县推广普通话的经验。同月,福建省推广普通话现场会议在大田召开,这给全省推广普通话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1961年以后,运动性扫盲的历史基本结束,福建农村扫盲工作整体上转入常态化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实行,农村儿童入学率显著提高,带动了农村整体识字率的提升,传统扫盲工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文盲比例持续减少。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历史,尽管运动中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限,相关政策也迭有变更,但这场运动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农民从“睁眼瞎”成为“文化人”。这可以说是亘古未见的崭新变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扫盲运动并不只为教农民识字、促使农民实现“文化翻身”,还是一个从思想上塑造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的过程。例如,一些农民不愿参加学习和认为“学习是好,就怕学不会”的想法,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逐渐被积极参加扫盲、早日成为文化人的想法取代,进而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学习行动。

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师资政策,则是发动有文化的当地人担任扫盲教师,从而夯实了国家开展扫盲运动的硬件基础。“政府领导、农民自办”的办学过程,更是成为农民与国家互动、最终体现国家政策的具体场域。

不难看出,这些举措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也塑造出拥护并实现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为社员的文化学习时间,农事较忙时则缩短半小时,周六上政治课和生产技术课,周日则是举行党团活动和合作社会议的时间。该乡还特别强调,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占用社员的学习时间。至于扫盲数字,1956年尤溪县“轰轰烈烈高高高兴兴搞扫盲”,最终发动3万多人参加学习,扫除4000多个文盲。

实践中,从农民参加学习到实现脱盲的整个过程,都服务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种任务的需要。据档案记载,在当时的永定县古城镇乡,民校发动学员投入除虫运动,一共点了200多盏诱蛾灯。秋旱时民校全体学员投入抗旱,共挑3900多担水,抢救了40多亩受灾最严重的稻田。而闽侯县西塘乡的许多民校学员在修水库、统购统销和扩大合作社等工作中都起了带头作用。已经脱盲的农民则进步很快,有的担任合作社社长,有的担任会计员,还有一些当了生产队长、小组长和记工员。由此,农村干部队伍得到充实,集体经济的维持和发展有了切实保障。

1958年以后,伴随着生产跃进的高涨形势,扫盲运动也进入最高潮。在此过程中,许多

生动的扫盲故事浮现出来。过去很多山区的偏僻乡村和沿海一带的小岛一直是文化学习的空白之处,此时大部分也办起了扫盲班,并且涌现了“夫妻挑战”“婆媳互助”“父子同学”“三代同堂”等热爱学习的新气象。三明公社团委还发动脱盲青年开展“读百本书,写万个字,天天学读报,周周写诗”的活动。在全省范围内,“白天千军万马闹生产,晚上千家万户读书声”的动人局面开始出现。

1958年3月26日,《福建日报》报道了全省第一个无文盲乡——古田县秀峰乡的先进事迹。此后,1960年3月14日的《人民日报》也对秀峰扫盲给予特别关注:秀峰乡在1957年夺得福建省的扫盲冠军之后继续努力不停歇,到1960年,除极少数青壮年还在读高小以外,大部分已升入业余初中就读。即使是原来一字不识的党支部书记,这时也读初中了。原乡长经过几年认真的业余学习,从文盲升入业余初中,1959年夏考入厦门大学理科预科班学习,成绩达到优良水平。

除了描绘秀峰这一先进典型,《人民日报》还指出,从海防前哨岛屿和渔村,到广大山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农村扫盲所用的课本

艺苑大观

# 福州脱胎漆器佛像工艺探秘

□张小燕 邵洪哲 文/图

福州脱胎髹饰技艺是中国传统工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其“轻盈坚韧,色彩瑰丽”的艺术特色在国内外享有诸多美誉,而脱胎漆器佛像是其中最具有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

福州脱胎髹饰技艺中的脱胎技法源自于佛教造像所催生的干漆夹纻技法。这种技法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在南北朝时随佛教的兴盛而被用于佛教造像中。在隋唐时发展至成熟,但由于两次灭佛运动,这种技艺在晚唐后几乎要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到了清代,福州人沈绍安在修补牌匾时,受到牌匾破损显露出来的夏布启发,重现出这一技法。此后,福州漆器技艺中的脱胎技法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

到了现代,福州漆器的脱胎技法已经形成了固定、繁复的流程。以脱胎佛像为例,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先用泥或石膏制作出佛像的坯胎。晾干后,用大漆和瓦灰调和成的漆泥将夏布或者棉纱等贴在坯胎上,再用更加细腻的漆泥将其表面涂抹光滑。待阴干后敲碎原胎,留下坚硬挺括的漆布外壳,最后经过多次上漆打磨和髹饰,就成了脱胎漆器佛像。

这样制作出的脱胎漆器佛像,褪去了布料棉纱的柔软易损,变得更加坚韧,同时相比传统漆器可谓是轻盈若羽。在过去那个没有塑胶等轻便易塑材料的年代,巨大的木制、泥塑、陶塑佛像等过于笨重,难以满足游神拜佛的需求。因此,“举一羽轻,视之九鼎兀”的脱胎漆器佛像就成为塑造这类佛像的不二之选。

其他材质的佛像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褪色风化,难以保持原有的色泽和装饰效果。而脱胎漆器佛像还有抗酸、抗尘、抗火的优点,在日常使用中能轻而易举地保持光亮如新。可以说脱胎漆器佛像的使用过程是福州脱胎髹饰技艺体积大、质量轻、坚固耐用、不易褪色技艺特色的充分展现。

在前有青铜的厚重、后有瓷器温润的中国艺术史上,漆器能够承前启后,兼具厚重温润、光芒闪耀,离不开它种类繁多、精工细作的髹饰技艺。髹饰是漆器制作过程中重要的步骤,大漆的外观美多取决于这一。《尚书·梓材》有记载:“惟其涂以漆,丹以朱,而后成。”由此能看出漆器最初诞生主要以黑、红二色为髹饰。其后五行学说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改变,漆器的髹饰中因此又增添了白、青、黄三色。再后来,各地的手工艺匠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各种材料运用到漆器的装饰上,使漆器的髹饰技艺变得丰富多彩,逐渐



脱胎佛像

形成各地的地域特色。

20世纪初是福州脱胎髹饰技艺发展的飞跃时期。传统手工艺匠人发现将桐油加入调好色的漆料中,能够改变漆料的纯度和明度,使得髹饰色彩有了深深浅浅的变化,但传统的色漆多用天然的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着色,色彩种类较少。到了20世纪初,受社会科技巨变的影响,手工艺匠人在继续使用传统颜料髹饰漆器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化工颜料,增加了更多的色彩种类。

例如,单一的红色此时就发展出了超过

15种不同的色系,而黄、绿、青、紫等颜色也都发展出了10多种不同的变化。金银材料也被大量应用在髹饰中。其一是应用在“笼色”技法中。“笼色”技法是先将金粉、银粉调制到漆料中去,将其涂在漆器表面,然后在涂好的底漆上再用红色或蓝色等敷拍髹饰;其二是将常用于民俗活动中的金箔纸直接或捣成粉髹饰于器物的表面,达到金碧辉煌、光耀照人的效果。

到了现代,福州漆器髹饰技法已经发展出20多种,例如有黑推光、色推光、锦纹、薄色料、



韦驮菩萨

晕金漆画、仿古铜、嵌螺、嵌银上彩、宝石闪光、堆漆浮雕、仿彩窑变、仿青铜、仿唐三彩和绳纹技法、暗花等工艺。这些髹饰技法和丰富的色彩选择结合起来,使得福州漆器表面装饰更加绚丽多彩。

色漆料的丰富使得福州脱胎漆器的髹饰有了更多的色彩表达,打破了漆器一贯柔亮、含蓄的审美表现。福州技艺多样的髹饰技法,能够细致勾勒出佛经故事、花鸟动物等精致的装饰图案,施以五彩斑斓的色彩,彰显出“错彩镂金,雕缛满眼”的美学范式。